

信義書房漫話之二

專家前輩啓發「書目」興趣

吳相湘

「書目」的重要性，比較市街、公路、鐵道、港口、飛機場的指引標誌，可說是過之無不及。任何人沒有「書目」的嚮導，就難得閱讀新書好書。如果隨手亂翻書，可能誤入歧途，產生惡劣影響。我今日得稍稍知曉求學讀書的途徑，實由於四十年前在北大肆業時，專家前輩啓發對「書目」的興趣，避免了盲撞摸索的苦痛。教誨深恩，此生不忘。

• 23 •

「書目」也就是「目錄學」，在中國已經有二千年的歷史。但在農業社會的中國，萬事萬物，不是牛步化的發展，就是停滯不前。「書目」自然不能例外。尤其「書目」大多是宮庭史官編輯，官僚敷衍氣味充滿於正史的「藝文志」「經籍志」裏，更顯得枯索

不實不盡。甚至中國近代清乾隆朝編輯的「四庫全書總目」，也祇是迎合帝皇意旨，用盡一切手段焚燬明清之際有關的典籍；總纂紀昀（曉嵐）以下人員照例上班，沒有誠篤從事工作，又因限期完成命令，更無從詳細考訂，以致錯誤百出。

當我在湖南明德中學讀書時，閱讀史地書籍的興趣非常濃厚，却並不知「書目」之學。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書店按期寄來的「圖書彙報」，也祇有書名作者譯者定價，並沒有內容提要說明。我利用憑摺記帳購書的便利，不知選擇，隨時觀買一些新刊書籍，粗略翻閱一過，引不起興趣，也就堆置起來。金錢時間因之浪費不少。民國二十二年夏，我負笈北上，入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開學以前，拜見余季豫（嘉錫）姻伯，眼見他老雍容坐擁書城，懇切指示「書目」的重要。頓使我茅塞初開。一年級課程中有趙斐雲（萬里）教授主講「中國史料目錄學」，三年級課程中有陳援菴（垣）師主講「史源學實習」；同時，姚從吾師主講「史學方法」、陳受頤師主講「西洋中古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胡適之師主講「中國古代思想史」、傅孟真（斯年）師主講「中國古代文學史擇題研究」、孟心史（森）師主講「滿洲開國史」、「明清史」、錢賓四（穆）主講「秦漢史」、「近三百年學術史」諸課程，都着力提示有關的史料目錄，並不注重史實的描述。專家名師前輩是這樣的諄諄善誘，魯鈍如我，也不能不深受啓發了。

「四庫提要辨證」不朽巨構

余季豫姻伯是中國目錄學權威，「四庫全書提要辨證」（臺北藝文印書館有刊本），是他老積五十餘年歲月寫成的不朽巨構。他老自述：幼年居湖南常德故鄉，即斐然有著述的雄心，十四歲時作「孔子弟子年表」，十六歲時注「吳越春秋」。少年氣盛，不知學問真諦。後來經親長提示閱讀張之洞「書目答問」，才發現學海浩瀚，驚駭之餘，頓有茫然失據無所適從的感覺。再繼續讀張之洞「輟軒語」，其中一句話：「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季老給予一指路明燈，成爲一生興趣中心所在。清末民初，余季老自故鄉往長沙、北京各地，友朋漸多，見聞也廣濶。民國十七年夏，北伐成功，余季老就定居北平，擔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文學院院長，同時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目錄學」。我和季老有姻親關係，課餘假日時常到他老家裏去，比較一般同學在教室聽講所得更加切實。

北平是中國文化中心，公私藏書衆多，尤其罕見善本珍籍的收藏家也時常和余季老往來；因此，季老憑藉這些優厚條件致力於四庫全書提要考證的工作更加勤奮——他老自知生平於經部心得不深，集部自犖犖數十家以外，可傳世的甚少；祇有史子兩部宋朝以前書未見的少，元明兩朝書籍也多涉獵，因即將心力集中於史部子部諸書。每讀一書，必小心了解辭意，平情審察是非；至於搜集證據推敲事實，雖細如牛毛，密若秋茶，不敢忽略，必權衡慎重才寫在紙上。讀書續有所得，又隨時修改——他老不是應用新式卡片，仍舊用傳統簿冊。我曾有幸，蒙他老人家將這些簿冊給我看：冊的上下四周都寫滿了密行細字。朱墨淋漓，不可辨識，又另換一稿。方法雖仍舊貫，條理却極分明。民國二十六年夏，中日關係緊張，「四庫提要辨證」寫定稿二百二十餘篇先行排印，以免散失。抗日勝利後，重加編定，共取四百九十篇，民國四十四年秋刊行，將「四庫全書總目」許多錯誤都加糾正，如二十四史提要中即有十三史，經余季老重加辨證其錯漏，他可想見。

「書目」錯誤，影響國家

余季老定居北平撰述是書時，正日俄交相侵略我國緊急之秋，故書中於有關書籍、辨證更再三注意。如「坤輿圖說」案語引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後有云：「今案稻葉氏責紀氏（昀）卑視西學，蓋是也。其實距今二百年前，以飽讀線裝書之人，而欲其重視西學，殆可謂之絕不可得，何獨責之紀氏。第稻葉謂四庫全書，不入之地理，則『提要』正著錄於地理類外紀之屬。稻葉此言，可謂如盲人之墨白。」湘按日本人稻葉君山撰「清朝全史」，自民國三年經但懋辛譯爲中文交中華書局刊行，至今將六十年，臺灣版仍銷行不衰。國人對清代史研究之忽視，半世紀以上光陰白白浪費，可大嘆惜。

余季老撰「四庫全書提要辨證」中「異域錄」一書案語有云：「圖理琛奉使絕域，不辱君命，采風問俗，文采斐然；即其持節出疆，蒞盟定界，所定通商條約十一款，亦復與後來喪權辱國者殊科。雖曰席強國之威，采廟謨之略，然其折衷樽俎，有足多者。其

卒以乾隆五年，距修四庫全書不過三十餘年，其人既非碌碌者流，而又官至卿貳，八旗通志立有專傳，皇朝通典邊防門、皇朝通考四裔考亦詳載其以郎中侍郎兩次奉使（俄羅斯）事蹟，而館臣纂提要者，乃不能詳其仕履，是亦可謂異聞也矣。至謂俄羅斯之地爲自古與地所不載，亦爲失考……當時士夫故步自封，不知留心外事，故徒爲大言，而未嘗夷考其實也。」

今按圖理琛是康熙五十一年（西曆一七二二年）

因俄羅斯對我西北有侵略企圖，奉使前往處理，臨行，康熙帝面諭：「見俄羅斯察罕（彼得大帝）時，如問中國何所尊信？但言我國皆以忠孝仁義信爲主，崇尚尊行，治國守身，俱以此爲根本……如問生計：但言隨處皆同，富者亦有，貧者亦有。」「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亦須留意。」聖諭煌煌，指示篤實，載在實錄，而四庫全書館臣都不注意。乾隆一代政風遠不如康熙時的純樸，滿清皇朝盛極而衰，對俄對英關係日漸惡化，都從此肇端。「書目」是一國知識水準的標誌，也可反映國勢的興衰。這是一顯明事例，如今大學文史系學生知圖理琛何許人？異域錄是何內容？爲數恐不甚多。而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

學今西春秋教授「校注異域錄」巨冊行世，相形之下，我們朝野不注意知彼知己，尤其對日俄近隣更是茫然，由來久遠。遭受凌辱侵略，可說「國必自伐」。這是始終不認識了解「知識即力量」和「書目是指南針」的重要性，自然產生的惡劣影響。再看近六十年來我國各種「書目」，其中有幾種有關日俄的新書好書？更何能怨天尤人？

東施效顰挑紀曉嵐的毛病

國立北京大學以「國學」研究著名。所謂「國學」就是中國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等等。胡適之先生且公開申言：這一切的研究都離不開它們歷史的演變，而這些科系現都屬於文學院；看來將文學院改稱史學院更切實際了。因此，我們史學系的師友常引爲自豪，更相互勉勵絕不可拾人牙慧，要提出前人所未知的新見解，糾正古人古書的錯誤。在這一偉大目標下「書目」自然更重要——正如姚從吾師當時形容：「書目」對讀書人的關係，正如市場行情表和商人一樣的密切。我既可隨時請教數位教授，更有夜晚或假日隨

時前往余季豫姻伯家請求指引的便利，因之對「書目」更特具興趣。民國二十四年秋，正當我在史學系三年級肄業時，陳受頤師講授「中歐文化接觸史」。我們按規定必須提呈研究報告。我對西洋音樂傳入中國的早期史實很有趣味。在北大圖書館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等處詳細檢查有關中西文書刊目錄。非常幸運的：在北平圖書館發現「律呂纂要」二卷，康熙間精鈔本，目錄卡片註云：「似是律呂正義續編稿本」，未能定爲何人撰著，因書名下被剪去數寸，正是一般書撰著人著錄地位。我因此再檢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樂類存目著錄「律呂纂要」有云：「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分上下兩篇，每篇各十有三說，大意以律呂之要在辨其聲音之高下長短；上篇則發明高下之節，下篇則發明長短之度，似乎近人節錄欽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但我詳細閱讀北平圖書館收藏的這一「律呂纂要」，灰綾封面，裝幀極精，字蹟圖譜尤工整，完全內府書籍格式。專家前輩告知：北平圖書館若干藏書原是內府流出收購或移存。加以北平圖書館另有同書另一鈔本，內容與灰綾封面本完全相同。第一卷首頁書名上鈐有黃色油墨

小長方形印記，文曰「康熙皇三子誠親王殿下賜」。檢閱東華錄知誠親王是康熙朝奉命纂修律呂歷算書籍的主持人，因此推斷「誠親王賜」的鈔本是纂修律呂正義時據內府藏本鈔錄的副本。我比對兩書內容相同，上下兩篇各十三說，共二十六說，而律呂正義續篇祇一卷，共十八節，比較這「律呂纂要」簡略，四庫全書提要末句「似乎近人節錄欽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完全將母子關係及內容詳略完全顛倒了。我將這些發現詳細向余季豫姻伯、陳受頤教授陳說，他們都認爲我的推斷是正確的。

我閱讀「律呂正義續編」總說提到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將西洋音樂書傳入中國。因再檢閱天主教士東來的西文書刊。在杜哈德編撰「中華帝國誌」（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一七三六年英文譯本第三卷中記載：康熙帝命將徐日昇進呈樂典採入律呂正義續篇——英譯本中且將樂典原名 Elements of European Music 用斜體字印刷，表示是專門名詞，這正與「律呂纂要」中文書名適合。上述北平圖書館藏是書灰綾精寫本書名下剪去數寸，正是康熙末年

禁傳天主教，雍正乾隆時更雷厲風行，故不得不將西洋傳教士姓名剪除，甚至律呂正義續篇總說已提到了徐日昇，四庫全書館臣也不敢寫出來。

余季豫姻伯、陳受頤教授命我將研究結果寫成「律呂纂要跋」，原擬附原書影印發表。不幸因日軍在華北橫行，北大無暇及此，而陳受頤師就將原稿抄本寄送廣州大光報，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六日刊載於該報「文史周刊」第五期。當時，我不知道。直到民國五十八年陳師才自美國寓所藏書中發見寄我。（參見「近代史事論叢」第三集）在此以前，我曾向余季豫姻伯再三陳說：「我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東施效顰，學老姻伯榜樣挑剔紀曉嵐的毛病」。余姻伯笑說：「你初出茅廬，就能挑出他的一項毛病，已經了不起。」

如今我不自嫌醜陋，述說這段往事，絲毫沒有自我誇耀意味，祇是拿事實來強調「書目」的編製實在需要小心謹慎，一定要儘可能的查閱參考書刊，不能隨便動筆，自欺誤人——如本文篇首陳說：「書目」如鐵道指引標誌一樣的重要，試想想：今春二水慘重車禍的發生原因，就應該格外警惕。

中國史料目錄學擴大心胸

北京大學史學系一年級課程中，趙斐雲（萬里）教授主講的「中國史料目錄學」，是一學年必修課程計八學分，即每學期每周四小時。可說是主要功課。四十年來，我總喜向各大學文史教授提及這一課程對我個人啓迪的功効以及它對當今文史學生的重要性。實在是這一課程在啓發我對史學的認識，擴大我對史學領域的心胸影響太「大」——「大」得無法用筆墨文字來形容。

早在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即刊行鄭鶴聲教授編著「中國史部目錄學」一書。這是鄭氏在原東南大學以及改名國立中央大學的講義，是按經史子集四部的傳統而命名，內容自然也依千百年舊貫以史部要籍爲主。但在是書出版以前，王國維（靜安）先生早已在國內著名雜誌發表專文指陳：自一九〇〇年以來，中國史學領域由於下列四項發現或公開而特別擴大：①、殷墟甲骨文的發現。②、西北考古隊發現漢代長城遺址以及大批漢代簡牘。③、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

公開。④、六朝墓碑及敦煌石窟的發現——王國維先生文字發表以後又有：⑤、清宮文獻圖書古物的公開。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作有計劃的科學考古發掘，獲得更多甲骨文以及青銅器等遺物。因之，史學領域更加擴大，應用以史籍爲主的傳統「史部」觀點顯然太狹窄，不適合學術的進步了。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正是胡適之先生所說「新北大旗幟開始招展」。空前國難來臨，北大師長們更決心加強「國學」「科學」的教學與研究。文學院在胡適之先生領導下更銳意革新，注重「中國史料目錄學」就是一重要新觀點的創立：使學生心胸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史籍，更要注意上述的各種新史料——應用「史料目錄學」，不祇是「必也正名乎」，更是要求學生「名實相符」的在新擴大的史學領域中切實努力。

趙斐雲（萬里）教授是王國維先生的姻親，國維先生應江南劍北著名藏書家及古物收藏家約聘爲他們審訂編製目錄說明時，斐雲先生曾擔任主要助手，見識既廣且深。民國二十年頃出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組主任，接觸的珍籍稀見文物更多。因之，在北大主

講「中國史料目錄學」時，分發講義以外，每堂課總是在下一堂教授站在教室門口了才不得不結束。趙老師在講授之餘，又經常帶領我們到北大及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庫參觀，娓娓談說宋刻本以下版本源流，並拿出各種版本相互比較。自然給予學生深刻的印象。

「中國史料目錄學」開啓了我對「書目」更廣闊的視野與興趣。當日軍步步進逼華北，北大師友懷抱「最後一課」即將來臨的悲憤心情，充分把握時間切實努力。專家前輩給予我們一盞指路明燈，實在是此生不忘的深恩。

北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有「語音學實驗」，在當時國內大學已是獨創一格。陳授菴（坦）師主講史學系三年級「史源學實習」，在國內大學文學院也是「空前」甚至「絕後」——我敢於用「絕後」兩字是四十年經驗累積並且很慎重說出的。因爲抗戰勝利前後，教育部新訂各大學史學系課程，「中國史料（部）目錄學」列在四年級，比較我在北大肄業時列在一年級是「高陞」，實際上是「降低」了三年！而若干大學還很少開設這一課程。記得十餘年前，我還在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系任教時，我主講「中國近代史」每周

三小時，其中一小時講授「近代史料要目」，內容包括中外有關的重要史料。但我仍不滿足，再三在系務會議提議要求開設「中國史料目錄學」課程，以便學生有進一步研究的指引。幾經折衷，才有「史部要籍解題」一課，由夏德儀教授主講。不料近三年新頒的大學史學系課程，不祇這一「中國史料目錄學」沒有列入必修課，即中國斷代史也只有選修兩段的時間與學分。許多人浩歎當前學生文史程度低落，實則不自在臺灣始。而是如今更甚了，這是「上有所好」的自然結果。「中國史料目錄學」被忽視，更是教育部聘請的各大學教授的責任。今特揭出，如有關當局再不虛心切實檢討，「復興中國文化」的責任真祇有仰賴各國劇團隊名伶了。

版本學和目錄學（書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在當今臺灣各書局對於「版本學」却出奇的藐視。例如鴉片戰後刊行的第一部有關外國情勢的書——魏源編撰「海國圖誌」，初版是六十卷，後來又根據新資料加以增補刪改，最後定本是一百卷。這書對於日本明治維新且曾發生很大影響。如今臺灣書商在影印古籍宣揚中華文化美名下却是取是書六十卷本作底本。完全辜

負了一百餘年前魏源不斷增補以求適應新情勢的苦心。又如一部記載俄羅斯史地的書「朔方備乘」——清季何秋濤編著。如今臺灣書商影印却隨手亂寫「李鴻章編纂」。這些事例應更加强上述「書目」與國勢密切關係的論證。不幸我們迄今仍不注意。實在令人浩歎。至於有人將大陸近年刊印古籍，改頭換面，將自己大名列做編著人，滿以為名利雙收。殊不知流傳海外，各大學圖書館中國籍職員一加比對，他個人醜態畢露事小，自由中國出版界聲譽的損失就很難以補救了。

日本努力編製中國書目

「大家努力將世界研究中國文化中心建立在北平」！這是胡適之傳斯年和北大諸位師長多年以來再三提示的大目標。胡先生在這一號召下，要求大家應用綉花針繡鴛鴦的手法一針一針的切實工作，同時更提醒大家：千萬不可故步自封，閉戶造車；一定要盡一切可能注意、利用、參考外國收藏的有關資料和外人研究的書刊；必須這樣才可以「閤中肆外」，「博古通今」。而編製「書目」自然就是一切的大前提。

但北伐成功以後，內亂外患無時或息，甚至變本加厲。北平九所國立大專院校每月按時由南京財政部匯撥經費三十六萬銀元，比較北洋軍閥時期各院校教師經常三數月甚至半年領不到月薪已經大不相同。要想大事「修文」實在非常困難。然而北平圖書館和各國立院校在極力節省原則下編印出：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書籍聯合目錄（有關中國事務），國學論文索引、文學論文索引、地學論文索引等。同時，北大國學季刊、清華學報也按期出版。長江、珠江流域各大學及圖書館也和北平一樣共同努力。對日抗戰前四年被稱為「中國近代學術黃金時代」就是在這一背景襯托下出現的——但這只就中國國內各時期相互比較，如果和世界各國有關研究並列仍瞠乎落後。

自十八世紀以來，法國人就自詡巴黎是全球「漢學」研究中心，敦煌寫經卷頁被法英人捆載而去以後，歐洲有關中國文化資料的收藏更較豐富。而俄羅斯人因尼布楚條約（一六八九年）、恰克圖條約（一七二五年）的簽訂，更獲得商隊和學生按時進入北京的權利，認識了解中國自然尤多便利。赤俄政府成立後更注意「中國人如何想如何做如何寫」，且專設機構

改寫中國歷史：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是「農民起義英雄」，關羽曾國藩等都是「地主惡霸劊子手」。忠奸是非完全顛倒。日本學人仰軍閥鼻息也盡全力於侵華工作。只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北京日本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以及京都大學按時刊行的「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洋洋巨冊，書名、著者、類別三項索引通檢俱全，極便查考。國內任何圖書館還沒有應用過如此人力、財力從事這樣的精細工作！

對日抗戰以前，日人的東亞同文會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上海及大連圖書館收藏漢籍衆多，且曾刊行各種書目。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這些圖書館竟被劫收而四散。但近二十餘年來，日本為爭取世界「漢學」的領導地位——尤其是美國人始終認為日本是中國近鄰，了解深切，重視日人研究，故日本各大學及學術機構積極從事研究中國事務。「近百年來中國文獻現在書目」、「近畿現存中國近人書目」，是東京京都兩地公私圖書館收藏中文書刊的簡報。日本外務省研修所中且有專門收藏中國法律書刊的「大木文庫」，也有書目刊行。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

究會」並且進一步編印「經世文編總目錄」二冊又索引一冊、盛宣懷袁世凱奏議目錄一冊、左宗棠張之洞薛福成張謇奏議目錄一冊、近代中國研究資料目錄一冊。日本外務省也刊行「日本外交文書」（明治元年至明治三十九年）總目次一冊。其他有關中國書目甚多，無法詳述。總之，日人是仍舊在用全力製作打開中國門戶的鑰匙（書目）。我們能不警惕！

美國人起步遲進步快

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比較東西各國起步遲，但近三十年來挾豐富的財力人力注重於此，已經表現出使人刮目相看的突出成績。自由中國、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國有關中國近代現代演變的研究學人，大多出自美國著名大學。這些大學本身刊行有關書刊更是中外學人必需參閱（不論你是否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書籍篇末照例有詳細的中西日文關係書目，甚至在原書以外另刊「書目解題」一冊，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即是一例。

哈佛大學編印的「中文中國近代史書目」與「日

文中國近代史書目」出版於本世紀五十年代，由於這十餘年來新史料不斷出現，自然顯得不盡不實，但仍不失為一基本參考書目。同樣的：哥倫比亞大學刊行「中國共產運動中文資料目錄」、「中國共產運動日文資料目錄」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史丹佛大學刊行的「二十世紀中國領導人物書目」比較一九七一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民國時期名人傳記第四冊刊載的引用及參考書目又瞠乎其後。「書目」應與時俱進，這是顯明例證。

美國國會圖書館向有將印製的圖書目錄卡片贈送各國主要圖書館的規定，對日戰前，我國立北平圖書館等即曾受贈與，現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也獲得同樣贈與。這對於學人檢查全球新書實在非常便利。十餘年前，英國倫敦大學遠東非洲學院將收藏圖書目錄卡片影印成冊出售，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及史丹佛大學也先後用同樣方式將目錄卡片影印成冊出售，對世界各地有關學人給予莫大便利。即如我們在臺灣的人只要到國立中央圖書館「目錄中心」去查閱上述參考書刊，就可寫信美英請求付費影印應用。這是二三十年前各國學人無法享受的便利，自然這是今人更

注重「書目」并將它的運用擴展到全球。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一八九五年—一九六五）自神州赤沈，幸逃出鐵幕，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擔任顧問，編輯「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以外，更完成一偉大書目即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這是繼法國漢學家高狄編「中國書目」（Henri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以後幾十年來一巨構。其中收錄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五七年刊行的一萬八千餘種西文書目解題——包括英文、法文、德文以及澳門刊行葡萄牙文字書刊。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今臺北有影印本。

- 袁同禮先生又編印 *Russian Works on China* (1918-1960) *In American Libraries*。兩書配合檢查，歐美人對中國的認識了解程度如何，可見大概。後來，袁先生又編印中國留學歐美博士論文目錄三種
- 33 •
- ① •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其中約含三千餘題目。② •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③ •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這些「書目」都是可供我們做知彼知己工夫之用的。只是這十餘年來，美國學人有關中國事務的研究更多新著。袁先生這些「書目」又需要補充。幸美國「外交季刊書目」每十年刊行一冊，收錄中國書目（包含中文）甚多，即我編撰書籍四種也被收錄在內。美國亞洲學會每年更刊行「書目」一冊，可供學人與時俱進。

從「書目」看孫文學說淵源

民國四十八年秋，我自美國參加一學會回國，向有關方面表示：外國人很希望知道自由中國——臺灣現藏書目！但國立中央圖書館經費拮据，幾經協商才由某書局按月協助新臺幣二千元用打字油印一新書簡報。

自從這一「小步」開始，中央圖書館經費需要增加，受到主管當局注意，因此，若干「書目」就在歷年節餘經費項下編製出版了。在這以前，「近百年來中譯西書目錄」，收錄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至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一九五六年）譯書連同重出譯本計五千零四十七種。雖不够詳盡，已可供基本參考之用。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刊行「善本書聯合目錄」，是匯集臺灣各公私圖書館藏本統編，這與「臺灣省公藏方志聯合目錄」同樣給予學人莫大便利。而「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民國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收錄期刊三百種，計分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六條目。如果再參考余秉權編「中國史學論文引得：一九零二至一九六二年」（香港亞東學社刊）。近六、七十年中國史學研究大要可見一般。

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北京科學出版社」刊行「中國史學論文索引」上冊，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其中第一四七頁收錄拙撰「讀王湘綺錄祺祥故事後記」，原刊南京中央日報文史副刊第二十四、二十五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六、二十三日）。原刊將「吳相湘」誤作「胡相湘」，這一「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將「胡」改正為「吳」。這可能是北大歷史系舊日同學的手筆。是年十二月，這一「中國史學論文索引」下篇出版，內附上篇「勘誤表」，其中有「誤：吳相湘。正：吳組

湘」。民國四十八年七月，我在美國哥大圖書館中友人特提示是書上下篇及勘誤表給我看，相與大笑。由於我居住自由中國，大陸上不容許我的大名出現，就故意將「相」字改作「組」字，以資遮掩。共黨極權下連編製「書目」也要聽命當權派的指使以顛倒正誤，這是一例證。

「書目」不只與國勢關係密切，研究偉大人物的學說思想淵源，「書目」也就是這位偉人所曾閱讀的書籍目錄更是重要憑藉。

我們是遵奉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的民有民治民享國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建國大典，孫文學說則是「革命先革心」的心理建設基礎，關係重要，不言可喻！——如國父在民族主義自序所說：有關三民主義的參考書籍在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時被燬了——因之，我們研究 國父思想淵源很難確言曾閱讀參考那些書籍，只能籠統的說「融會中外古今」。但非常幸運的是，民國二、三年「二次革命」發生，國父旅居日本東京時，向丸善株式會社購買書籍的發票今仍存草屯史料庫，由此可窺知孫文學說中若干淵源。

揚棄「上樑大吉」的傳統，採取外國「奠立基石」典禮，是孫文學說一開始即以建屋字爲例證說明：中華民國建國基礎在各縣人民的地方自治，而不是帝皇時代的爭名者集於朝。「中西人築屋有大異點，可於其舉行之典禮見之。上樑者注目於最高之處；立礎者注目於最低之地，注目處不同，其效自異。」「今幸天佑中國，授吾同胞以復國建設之機會，則自高自低，宗旨不可再誤。」「今建中華民國亦與古國不同，既立以後，永不傾仆，故必築地盤於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也（民國五年七月十七日，國父講「地方自治爲建國之礎石」）。今由日本丸善書店發票得知中山先生這一非常重要觀念的淵源，是民國二三年旅居東京閱讀英文新刊的結晶。例如丸善發票記載：○、森田：和漢洋家屋諸造作應用圖案。○、佐藤：西洋建築用圖案。○、小野：折衷洋風建築設計圖集附解說。和洋住宅建築圖案。○、三橋：大建築學。其他英文書甚多，今不具列。這可見中山先生提出「建屋字」的例證，不只是根據自己訪問世界各國經驗，更尋求了學理根據。以一反三，孫文學說的思想淵源可以概見。

幾年以來，國立中央圖書館和民間都注意到「書目」的重要性，對於我這一對「書目」特具興趣的人說來實在是莫大好消息。我逛書店、上圖書館不浪費時間精力金錢，就是這「指引」的恩賜！

①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②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③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④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 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大江版年度小說售完不再印行，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四冊合購優待價七十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